

西歐與美國國家安全

林 岩 哲

一、北大西洋上的陰霾

有人說：「處在核子時代裏的一個強權，其最優先的目標，即在求穩定」^①。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如果說有這麼一個地區，包括數個國家，而却又能持續維持三十多年的和平與穩定，那便是西歐。由於西歐近三十多年來的和平與穩定，所以西歐各國能夠從戰後廢墟中重建家園，而至經濟社會的成長和繁榮，其國民生產毛額總合幾可與美國相比。所以說，西歐是這動亂世界的一個穩定島 (an island of stability)^②，並不過甚其詞。

不過西歐得以持續這三十多年來的和平與穩定，毫無疑問的，是美國給予援助和安全保護所帶來的結果。雖然美國在五十年代一度投注在韓戰之中，也曾在六十年代陷身在越戰的泥淖之中，但自一九四七年美國對西歐實施馬歇爾計劃、隨後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來，西歐與美國之間一直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西歐需要美國的安全保護來抵制蘇俄及東歐共黨國家的威脅，而美國也意識到西歐的安危關係著美國的國家安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所以能持續這三十多年的生命，而成爲今日自由世界惟一碩果僅存的國際安全體系，其原因即在於此。所以近三十多年來，美國的外交政策仍以「重歐輕亞」爲主。正如一位著名的美國外交

註① John Newhouse,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in Henry Owen, ed., *The Next Phase in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3) p. 42.

註② Stanley Hoffmann, *註* Alfred Grosser, *The Western Alliance: European—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945* (New York: Continuum, 1980), p. vii.

政策學者在其書上的一章標題所標示的：「西歐：美國外交政策的樞紐」^③。

照理說，西歐與美國在安全上有相互的需要，具有唇亡齒寒的關係，雙方在共同對付蘇俄及東歐共黨集團的威脅上，應是合作無間，步調一致。但實際這三十多年來，西歐與美國之間，除了歐洲的幾樁重大事件，如一九五六年的蘇俄入侵匈牙利和一九六八年的蘇俄進軍捷克之外，在許多方面並不團結一致。危機一過，西歐各國與美國經常各行其是，時而背道而馳，甚或時有齟齬。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後，大西洋兩岸更籠罩著陰霾，西歐與美國之間的關係陷於冷淡低潮，顯得外弛內張。這不但是北大西洋上潛伏著的一股危機^④，也是自由民主陣線中亮起的一盞紅燈。西歐與美國在八十年代正處於安全伙伴關係接受考驗的時刻。

二、從孤立主義到國家安全的擴大

雖然美國的人種與文化主要出自西歐，雖然數百年來的國際政治係以歐洲為中心，但美國關切西歐的安危並非自始基於「血濃於水」的傳統感情。事實上，美國的傳統外交即在孤立主義。一七九六年華盛頓在告別演說中曾說過：「歐洲有其本身的利益，對我們是遙遠毫不相干」。其後一八一三年傑佛遜曾說過：「歐洲國家構成地球上的另一獨立部分，其位置造成他們的制度獨特的情況。他們本身有他們自己的利益，我們不便去管它。而美國是在西半球的另一邊，有其另一套的利益體系，必然不能附屬在歐洲利益之下」^⑤。所以一八三二年門羅總統提出門羅主義，亦不過沿承美國立國以來的傳統外交政策而已。他說：「歐洲強權的戰爭，只是關係到他們的事，我們從無參與的份，也不適合我們這麼作。惟有我們的權力受到侵犯或受到嚴重傷害的威脅時，我們纔不得不加以防衛」^⑥。

雖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美國曾一度活躍於國際政壇，但美國真正脫離孤立主義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一九四七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國家安全法，設立國家安全會議，並成立國防部及設置三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以統合三軍的指揮。從此美國脫離了孤立主義的傳統外交，走向國際政壇活躍。首先即對土、希給予軍經援助，隨即在西歐推行馬歇爾計劃，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集體安全體系。其後的各種協防援助計劃，無一不在國家安全名目之下進行。國家安全一詞成了近三十年來的

註③ Cecil V. Crabb, J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Nuclear Age*, 3rd.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chap. 10.

註④ See Lawrence Freedman, "The Atlantic Crisis," *International Affairs*, LVIII (Summer, 1982), 395-412; Morton H. Halperin, "NATO and the TNF Controversy: Threats to the Alliance," *Orbis*, XXVI (Spring, 1982), 105-116.

註⑤ Quoted in Julius W. Pratt, *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Englewood Cliff, N.J.: Prentice-Hall, 1955), p. 168.

註⑥ *Ibid.*, p. 169.

美國基本國策。

然而什麼是國家安全？雖然近代國際關係發生已悠久，但是國家安全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纔產生的新名詞。據所知，最早對國家安全一詞提出界說的是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李普曼在他一九四三年出版的「美國外交政策」一書上寫道：「一個國家不會因避免戰爭而就犧牲其正統利益，甚至為維護其正統利益，亦不惜訴諸戰爭時，即有安全存在」^⑦。但李普曼並沒有澄清國家安全一詞的概念，只不過以國家安全一詞取代國家利益而已。

事實上界定任何名詞原非易事，任何名詞的界說都可謂是衆說紛紜。舉些例子來說：

「國際社會科學百科全書」：國家安全是指「一個國家保護其內部之價值而不受外來威脅的能力而言」^⑧。
南非培特利亞大學戰略研究所主任勞歐（Michael H. H. Louw）：國家安全是指「一個民族國家享有不受外來物質威脅的狀況而言」^⑨。

美國國家戰略資訊中心出版的「國家安全事務講義」：國家安全是「政治家為保衛其政權之各項要素不受國內外之威脅，而想取得或保住的一種防護條件」^⑩。

雖然各方對國家安全一詞界說不一，但從上引的幾個界說，我們可發現幾項共同點：(1)有敵對國家或團體的存在。(2)涉及敵對國家或團體的行為與能力對本國之威脅，這種威脅可能關係到國家的存亡。(3)安全問題主要是一種防衛的性質，居於被動的地位。(4)主要涉及軍事方面的措施。

雖然國家安全問題主要與軍事有關，但非完全屬於是軍事問題。在政治上，如國家地理位置、邊界長度、敵對國之有無，甚至國民士氣、國內社會經濟狀況，以及人民對政府和政策之支持程度，皆可能與一個國家的存亡有關^⑪，也因此發生所謂國家安全問題。國家安全非僅發生在國際關係上。

註⑦ Walter Lippmann, *U.S. 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 (Boston: Little, 1943), p. 5; See "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XI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pp. 40-45, at p. 40.

註⑧ *Ibid.*

註⑨ Michael H. H. Louw, *National Security: A Modern Approach* (Pretoria: ISSUP, 1978), p. 10.

註⑩ I. S. Cohen and Andrew C. Tuttle,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A Syllabus* (New York: National Strategy Information Center, 1972), p. 1.

註⑪ *Ibid.*, p. 2; Amos A. Jordan and William J. Taylor, J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nd Proces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3-4.

此外，由於科技的進步和國際貿易的頻繁，今日一般又將國家安全的意義加以擴大，包含了前西德總理史密特所謂國家安全的新「經濟層面」(economic dimension)，亦即國家安全意指「國家藉各種手段以保護其主要的經濟與政治利益，以免此項利益的損失威脅到該國的基本價值與生存」^⑳。

在國際關係上，通常一個國家為對抗外來敵國的威脅，以確保其國家安全，其方式有三：(1)與其他國家結盟，以嚇阻外在侵犯的威脅；(2)透過國際安全體系，以嚇阻敵國的攻擊；(3)於上述二種方式之外，加強本國國力，以抵抗侵略^㉑。

在通常的情況下，一個獨立自由國家將同時運用這三種方式來確保其國家安全，但這三種方式之比重各有所別。若在一國際組織的集體安全體系之下，能有效的加以執行，顯然的，結盟和自我確保的重要性將相對的減輕。反之，一個外交孤立的國家，如南非和以色列，則需要加重提升本國之國力來確保其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問題固然關係著國家之存亡與各種價值之得失，每視敵我之客觀能力與條件而定，但威脅的感覺顯然又包含了一種主觀的判斷。因此國家安全問題的存在與否，還得視國家領導人的人格及軍民主氣狀況而定。威脅的估計亦將因人因事因時而有不同。這也是近年來各國趨向於依賴上述第三種方式以自保國家安全的主要原因。事實上，近年來很少自由國家單靠同盟和集體安全體系來確保其本國之安全，亦另有其不得已的原因。第一，從國際聯盟和聯合國的經驗來看，想藉國際集體安全體系來遏阻侵略，完全徒勞。第二，訂立各種同盟協防條約往往在許多情勢發生時，會引起同盟衝突對立的情況，以致左右為難。第三，聯合國在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方面，每下愈況，常為安全理事會之常任理事國所否決或為第三世界所左右，而往往難作正義公正的決定^㉒。

如果我們從上述的國家安全意義來看西歐與美國的關係，顯然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歐與美國同樣感受蘇俄及共黨勢力擴大的威脅，因而雙方利害與共，結成同盟，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安全體系，共禦外侮。但這三十多年來，美國國力衰退，不但蘇俄核子武力與美國並駕齊驅，而且西歐各國無論在科技或經濟上已恢復昔日先進地位。因此西歐與美國之間對東西方的和解日益分歧，對國家安全的感受愈顯差異。這也就是進入八十年代以來，西歐與美國之間關係趨於冷淡。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呈現外弛內張的主要原因。

註⑳ *Ibid.*, p. 3.

註㉑ *Louw, op. cit.*, p. 11.

註㉒ *Ibid.*, pp. 11-12.

三、外弛內張的美歐關係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蘇間的冷戰帶來了西歐與美國的同盟結合，其基石在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其基本策略即在圍堵蘇俄及共黨勢力。但在北約組織成立不到一年之際，首倡圍堵政策的肯南即悲觀地預言這一安全體系的脆弱。肯南在一九五一年出版的「美國外交：一九〇〇—一九五〇」一書上寫道：「軍事聯合的範圍擴大，理論上軍力愈增加，但却愈無法控制。聯盟愈來愈擴大的結果，愈不能在政治上取得統一。該做的事，其目的為何，其效果為何，愈無法達成共同一致。」所以肯南認為，參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歐美各國，對協防的政策，「將有不同的意義，提出各自特有的政治問題，却與共同的鵠的無關」^⑤。

一九五五年英、美、法、蘇四強在日內瓦舉行的高峯會議，啓開了西歐與美國之間分歧的序幕。尤其法國對英美之間的密切關係充滿了對「安格魯撒克遜」的不滿。一九五八年戴高樂重返法國政壇，法國的這種對「安格魯撒克遜」不滿更形加深。所以在戴高樂執政期間，法國對英國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百般刁難阻撓；法國一方面想依賴美國來牽制蘇俄，另一方面又要與美國比苗頭，爭排位。一九六三年戴高樂拒絕了甘迺迪的歐洲整合「大設計」(grand design)，正式否決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申請，同年又與西德訂立友好條約，事事無不為擺脫與美國的關係而努力。終於在一九六九年，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二十周年之後，法國從這個組織的國防體系中退出。

事實上，在六十年代西歐與美國的分歧，並非完全起自法國的攪和。美國當年陷身越戰，早在西歐各國之間引起不安。西歐擔心美國陷身越戰的結果，終將會使美國大量從歐洲撤軍，而減低對西歐防衛的承諾。一九七一年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曼斯斐曾兩度向參議院提出從歐洲裁撤美軍的建議，更印證了西歐對美國的顧慮不是沒有道理的。

西歐與美國之間所以有種種的分歧，主要就如季辛吉所說，在於「全球責任」(global responsibilities)與「區域利益」(regional interests)之間的差異。美國的政策考慮主要着眼於「全球責任」，而西歐只顧及其本身的「區域利益」。這種美歐之間的歧見，在一九七三年油禁以後，明顯的表現出來；到八十年代以後，更形擴大。當一九七九年底蘇俄進軍阿富汗之後，美國為懲罰蘇俄的侵略，曾要求西歐各國給予合作，杯葛莫斯科的奧運，但西歐除了西德之外，却不願美國之反對，照樣派隊前往莫斯科參加奧運。同樣的情形，對於伊朗扣留美國人質，美國也曾要求西歐共同給予伊朗經濟制裁，但並未獲得西歐的首

註⑤ George F.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 (New York: American Library, 1951), p. 97; quoted in William V. Thomas, "American Allied Relations," *Editorial Research Report*, 1980, vol. II, no. 3 (July 18, 1980), p. 537.

肯。

對於伊朗問題的歧見只不過是西歐與美國在中東問題上的小分歧而已。事實上，從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機以來，西歐插足中東和平問題的協商與建議，往往是在扯美國後腿。一九八〇年六月，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各國經濟首長在維也納集會所提出的中東和平計劃，就是一個顯例。這一計劃完全不顧美國一手促成的以埃及大衛營中東和平架構，主張承認巴勒斯坦人的自主權，認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有權參與未來的中東和平談判。顯然的，西歐偏袒阿拉伯國家，與美國向來親以色列的政策，是大異其趣的。事實上，西歐偏袒阿拉伯國家亦有其不得已的原因。西歐本身缺乏能源，百分之七十的石油採自中東，而美國需要中東的石油，已減低到全部消耗量的百分之十二。所以西歐比美國更需要中東的石油供應，也因此不得不對阿拉伯國家有所偏袒。

四、能源安全的爭執

毫無疑問的，西歐安全最大的威脅，除了國防問題之外，便是來自能源問題。西歐想要擺脫外來能源的依賴，恐至本世紀終了仍無法獲得妥善的解決。這種情況，就如一本書上所敘述的：「甚至在未來二十年的中程來看，我們無法想像預見西歐能擺脫外來能源的依賴。北海石油和天然氣生產不足；新的再造能源還不能應用；本土煤炭需要大量開發，而代價繼續上揚；核能需要大量資金，而且會受到環境維護者極力的反對；節用能源雖能略生效果，却不能自給自足」^⑩。所以從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機得到的教訓，西歐不得不分散能源來源，以減輕因能源而產生的安全威脅。近幾年來西歐與蘇俄進行天然氣交易^⑪，便是西歐尋求分散能源來源的安全措施，但也因此導致西歐與美國一度關係惡化，呈現緊張的情勢。

西歐與美國爲了西伯利亞天然氣交易問題，反顏相向，反唇相譏，導火線是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波蘭宣佈實施戒嚴法，鎮壓波蘭團結工會，美國採取經濟制裁，禁止敷設天然氣輸送管線技術的出口。當時西歐對美國這項經濟制裁認爲不但無法迫使蘇俄共黨集團的經濟崩潰，反而只會進一步加強蘇俄共黨集團的團結。而且此項交易的訂約原在波蘭實施戒嚴法之前，而美國宣佈經濟制裁則在此之後。更何況美國還繼續大量出口穀物予蘇俄。所以西歐堅持此項合約的履行。

西歐的這一反應激怒了美國。美國指摘西歐姑息養奸，甘冒將來受蘇俄勒索的危險。同時美國責備西歐有意推卸逃避北大西

註⑩ Bernard Burrows and Geoffrey Edwards, *The Defence of Western Europe* (London: Butterworth Scientific, 1982), p. 15.

註⑪ 關於西歐與蘇俄天然氣交易，詳參閔翁瑞廷撰，「西歐與蘇俄的天然氣交易問題」，〔問題與研究〕，二十二卷第二期（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六九—七九頁。

洋公約組織的共同責任，未將國防經費提昇到年度總預算百分之三的共同目標。因此在美國國內再度掀起新孤立主義的呼聲，在國會醞釀從西歐撤回一萬九千名美軍之議。

一九八二年六月，美國與西歐爲了紓緩雙方的反目情勢，在凡爾賽舉行了經濟高峯會議。但是這次的會議不但未能妥協雙方的爭執，反而加深了雙方的裂痕。法國密特朗重申法蘇雙方的平衡貿易不受任何協定的限制。因此雷根總統採取一項報復措施，宣佈美國國外子公司所產天然氣管線設備亦在禁運之列。雷根認爲，這是「原則問題」。

雷根的這一項決定更惹火了西歐各國。他們一致譴責美國的這項禁運措施無異是「超出國境」(extraterritoriality)的非法措施，欲將美國法律延伸到其他國家的國境，是違背國際法則的。因此施密特和密特朗鄭重聲明，西德和法國決不參加對蘇俄的貿易戰。英法兩國政府又進一步下令給其國內各公司，不必理會美國的禁令。西歐各公司也就在八、九月間開始爲蘇俄敷設天然氣輸送管。

美國對於西歐不予合作的措施，也還以顏色。美國威脅以提高從歐洲進口的鋼鐵反傾銷關稅至百分之四十，作爲報復；同時堅持其高利率和美元強勢的政策，使得西歐挽救經濟蕭條的努力受到阻撓。

一九八二年十月柯爾接替施密特出任西德總理，西德對美的態度趨於緩和。而在美國方面，雷根總統也在十月間向美國農民表示，保證在年內出售蘇俄二千三百萬噸的穀物。西歐對雷根這項宣佈不再反譏美國，認爲美國對蘇俄禁運採用雙重標準。一場美國與西歐之間的爭執，終於在雷根宣佈中止對蘇俄的禁運而告一段落。但是西歐與美國之間的新傷舊痕是否就此痊癒不再復發？這也是關切自由民主世界未來前途的人所憂慮的一點。

五、美歐歧見的根源

在一些人看來，美國與西歐的關係，就像一對久婚的夫婦，偶有摩擦，甚至齟齬，在所難免；但終能適時冰消歧見，渡過危機。美國與西歐所以有爭執歧見，主要是由於領導不當，導致政策沒有協調的結果。在這雲譎波詭的世界，美國與西歐渡過多少驚濤駭浪，終能安然無恙，友好如初；尤其難得的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維持至今三十多年不墜。所以說，美國與西歐這一對夥伴，特別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即使不是人類史上，也是本世紀以來，惟一最成功的國際組合」^⑧。

不過美國與西歐的歧見，並不單純是偶發事件，也不是新的創傷。正如一些國際觀察家所說的：「認爲歐洲與美國的歧見，

註⑧ Morton H. Halperin, "NATO and the TNF Controversy: Threats to the Alliance," *Orbis*, XXVI (Spring, 1982), 105-106.

只要國際局勢平靜下來，就會消失，這是危險而錯誤的想法。這些歧見根深蒂固，深植在歷史與組織趨勢之中^⑩。因此必須瞭解這些歧見的因素，纔能真正瞭解西歐與美國的關係；也惟有西歐與美國雙方能會悟這些歧見的因素，而且雙方彼此容忍歧見、彼此忍讓，美國與西歐的夥伴關係纔能持久不墜。

(一) 地理的差異

如果說，西歐與美國之間有一項先天存在而永遠無法消除的歧異，那便是地理位置。西歐與美國中隔大西洋，相距數千公里，而西歐與蘇俄相鄰為界，近在咫尺。照美國人的想法，西歐鄰近蘇俄，更應關切蘇俄的威脅。但對西歐而言，正因為西歐太鄰近蘇俄，所以特別擔心戰爭的後果，決心避免發生戰爭。不過美國又認為現代的戰爭，戰區和本土可以分開，而歐洲人却以為他們的本土就是戰場。所以在傳統上，西歐顧慮安全，着重嚇阻能力，注重傳統武器，主張裁軍；而美國重視戰鬥能力，偏向核子武器，力主國防的改善^⑪。

地理因素不但實質上隔開了西歐與美國，也產生了西歐與美國之間的政治與心理障礙。歐洲不但有國家的認同，又兼有區域的認同，因此在歐洲不但有東方西方之分，更有東方國家與西方國家之別。但在美國，國家的認同和區域的認同是同一件事。何況蘇俄也可視為歐洲國家。如果以歐洲對美洲而言，則地理上西歐反而與蘇俄有其共同之處。

(二) 歷史上不同的教訓

從歷史來看，西歐和美國經歷非常不同的經驗，因此有極大不同的教訓。過去六、七十年來，歐洲飽受兩次戰爭的空前浩劫，有許多國家曾被打敗，為外國軍隊所佔領。所以歐洲人的畏戰心理是可想而知的。當然美國人也不願意有戰爭，但近百年來，從南北戰爭以後，美國本土上再也沒有發生過任何戰事。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因為歐洲無能解決和平的威脅，美國纔逼不得已而參與的。

此外歐洲人似乎有一項二元邏輯的選擇。如果要在投降與死亡兩者之間選擇其一，歐洲人傾向選擇投降^⑫。因為從歷史看，歐洲大陸有許多國家都曾被外國佔領過，或者在極權政權下生活過，而被佔領或屈服於極權之下，都不是永久的。今日西歐有自由，過繁榮的生活，即證實了這一歷史事實。但一旦死亡，則是永久性的，不再復生。正因為美國未曾被佔領過，也未曾屈服在

註^⑩ Karl Kaiser *et al.*, *Western Security: What has Changed? What should be don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81), p. 11; quoted in *Crisis in the Atlantic Alliance: Origins and Implications*, by the Foreign Affairs and National Defense Division,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2), p. 9.

註^⑪ *Ibid.*, pp. 9-10.

註^⑫ *Ibid.*, pp. 2, 11.

極權之下，所以美國人永遠不瞭解歐洲人的這種想法。

英國的想法是介於歐洲人與美國人之間的特例。一方面帶有歐洲人的畏戰心理，他方面又沒有歐洲人的屈服心態。因為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受到重大人員的傷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受到猛烈的轟炸，但戰爭的結果，却贏得勝利，未曾被佔領過。

(三)意識型態的差別

雖然美國與西歐都主張個人權利，維護民主政治制度，支持平等的社會經濟制度，但西歐與美國的意識型態經驗有根本的差別，導致對蘇俄有不同的看法。馬克思批評資本主義根植於歐洲。西歐認為馬克思的此一批評，刺激了歐洲國家多採行社會計劃，所以在歐洲有各種社會主義政黨，甚至有不少的共產主義政黨。蘇俄共產主義對西歐的威脅也因此不像美國那樣嚴重。西歐認為在美國沒有一個堪稱真正社會主義的政黨。但是對美國而言，蘇俄共產主義完全是外來的制度，對美國一切制度是一種挑戰。民主與共產是絕對不能並容的。

(四)美國移民的變遷

美國先民主要來自歐洲，因此美國的重歐輕亞政策是美國的傳統外交政策。但是美國外來的移民趨勢逐漸從歐洲轉到亞洲。隨著這一趨勢的發展，美國的利益和外交政策也逐漸偏向亞洲。數年前「華爾街日報」的一篇評論中，建議美國退出北大西洋公約，即認為美國應將其政治軍事利益重心放在太平洋上。這篇評論提到：「廣大的太平洋盆地居美國彼岸。在那邊有許多文化正影響著美國。美國正吸收大量的移民。而這些移民不再來自歐洲。大夥移民是來自墨西哥、中南美洲、東亞及東南亞，而不是歐洲」^②。所以從未來亞洲人移美逐漸增加的趨勢看，美國開始重視亞洲的利益，將為必然的趨勢；美國重歐輕亞的傳統外交政策將式微，也是可以預期的。

六、美國與西歐的共同防衛問題

如前所述，西歐與美國的歧見，特別是在八十年代以後，益形加深。一九八一—八二年，雙方爲了出售蘇俄天然氣管線問題而的爭執，關係惡化到了極點。不但雙方的政府彼此攻訐爭吵，民間也相互譏嘲排斥。在西歐，反美反核子的運動風起雲湧。西歐的大眾傳播媒介盡是將美國的形像描畫成身佩雙槍，一副草莽好鬪的牛仔。同樣的，在美國民間新孤立主義的呼聲此起彼落。將

註② Ronald C. Nairn, "Should the U.S. Pull Out of NATO?"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15, 1981, p. 30.

西歐人看成意志薄弱、隨時準備投降、寧受蘇俄操縱的傀儡。

事實上，西歐與美國之間，爭吵歸爭吵，雙方關係的惡化並沒有達到決裂的程度。無論在政府或在民間，在維護民主自由制度上，在對抗蘇俄軍事力量日益擴大的威脅上，雙方仍然互有需要。一九八一年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在西歐所作的民意調查，顯示出大多數西歐人仍然支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支持美國^②。同樣的，西德亞倫巴赫（Allensbach）民意調查研究所在一九八一年十月提出的報告，也得到相同的民意趨向^③。西歐與美國在安全上的彼此需要，正如美國的外交政策研究主任沙布勞斯基所說：「極為顯然的，美國的安全還不能與西歐的安全此離。同樣顯而易見的是，西歐的安全最後還得一直靠美國的力量來維持穩定歐洲地方的軍事平衡。無庸置疑的是，歐洲是美國軍力運作的主要場所。美國在歐洲的軍隊所以維持現有的水準，主要是因為歐洲乃美國直接對抗蘇俄的區域，美國有義務防衛歐洲。同樣無可疑義的是，歐洲關切美國對西歐安全的承諾日益淡薄。用一句葛雷（Colin Gray）最近說的話，美國『在西方聯盟中，倒是像安全的生產者，而不是消費者。參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歐洲最後的依賴憑據，只有與美國維持關係來保障其安全，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實際可行辦法』^④」。

固然西歐與美國對蘇俄軍事日益擴張的形勢，同樣感到威脅，因而在安全上彼此需要同舟共濟來對付蘇俄。這也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所以能維持至今三十多年的主要原因。問題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應採取怎樣的國防政策纔能有效的保障美歐雙方的安全？這也是西歐與美國雙方另一個爭執的問題。從一九六〇年代美國採行所謂「彈性反應」（flexible response）戰略以來，美歐雙方對戰策的爭執，一直無法獲得妥善一致的解決。一九六九年法國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的國防組織，部分原因亦出自這一爭執。毫無疑問的，一直到今天，美國對西歐的安全保障仍然脫離不了「彈性反應」的基本戰略。彈性反應戰略的基本假設是美國沒有核子武力的絕對優勢。美國不能完全靠核子力量來保障西歐的安全。彈性反應的戰略要行之有效，嚇阻蘇俄及東歐國家對西歐的攻擊，需要三個支柱武力的平衡發展。這三個支柱武力即戰略核子武器、戰術核子力量以及傳統武力^⑤。

但是這些年來，西歐各國對美國的彈性反應戰略，並沒有認真的採取配合行動，以加強提昇其傳統兵力。其結果不但無法與華沙公約組織逐漸壯大的軍力成對比，而使北約組織的嚇阻力信度受到傷害；而且北約組織一旦受到蘇俄及華約組織的傳統武力

註② Kenneth Adler and Douglas Wertman, "Is NATO in Trouble? A Survey of European Attitudes", *Public Opinion*, IV/August/September, 1981, 50.

註③ *Daily Report, Western Europe*, November 2, 1981, p. J3.

註④ Alan Ned Sabrosky, "America in NATO: The Conventional Delusion," *Orbis*, XXV (Summer, 1981), 294.

註⑤ Bernard W. Roger, "Greater Flexibility for NATO's Flexible Response," *The Atlantic Community Quarterly*, XXI (Fall, 1983), 234.

攻擊，爲了防衛，只有訴諸核子武器一途。就如北約組織最高統帥羅傑所說：「北約組織將其國防押注在核子反應上」^②。

北約組織和華約組織在兵力上懸殊的情況，可從下列最近的資料顯示出來。華約組織已擁有兵力四百萬人，四二、五〇〇輛坦克車，七、二四〇架戰鬥機，一千架左右的直昇機；而北約組織只有二百六十萬人員，坦克車一三、〇〇〇輛，戰鬥機二九、七五〇架，直昇機一、八〇〇架^③。

美國對西歐一再施壓力，要求西歐充實提高傳統兵力，並不是沒有道理的。西歐這些年來國民總生產毛額可與美國相比，而美國的國防費用佔其國民總生產毛額的百分六，甚至於預計到八十年代中期將增加到百分之七·五。但西歐各國不但一直沒有將其國防經費提高到國民總生產毛額百分之四的起碼要求，以共同負擔北約組織的防衛責任，反而爲了加速其經濟發展，促進對東歐共產集團的貿易。這就是美國對西歐最大不滿的地方。

不過，西歐未提昇其傳統兵力，也有其所持的理由。在西歐看來，爲了維持歐洲傳統兵力的平衡，提昇西歐傳統兵力，不但非一蹴可幾，而且耗資甚鉅，對今日經濟不景氣的西歐而言，實無法負擔。況且提昇西歐的傳統兵力，歐洲的軍事平衡並不會因此獲得穩定，反而會增加東西歐的軍事競爭。從另一方面說，正如我們在上節所提到的，西歐害怕戰爭的心理，一直覺得不論是傳統戰爭或核子戰，其最大遭殃受害者是歐洲，而不是美蘇兩個超強。所以提昇西歐的傳統兵力，並不切實際，不能嚇阻蘇俄及華約組織發動攻擊。更重要一點的是，迄至目前，西歐對德國的軍國主義仍有餘悸，一直怕德國的軍國主義再抬頭。如果加強西歐的傳統兵力，將會增加西德軍國主義的抬頭可能。此外，西歐不願提昇傳統武力的另一原因，是由於深恐導致美國從歐洲全部撤退^④。因此，這些年來，西歐各國並不熱衷支持美國的要求，以提昇加強其傳統兵力。

不過西歐與美國在共同防衛上的爭執癥結，倒不在傳統兵力問題，而是核子武力問題。從一九四九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以來，美國對西歐的防衛承諾，即以「核子防護傘」來防衛西歐。但從蘇俄發展核子武器飛彈以來，西歐各國對美國戰略核子武器的嚇阻信度逐漸生出疑慮。英法兩國各自發展出核子武器，即主要出自這種疑慮。西歐對美國的核子保護一直有一種矛盾心理，一方面需要美國的核子保護來嚇阻蘇俄及東歐的威脅，他方面又擔心加強美國核子武器的結果，會帶來美蘇核子競爭，終而導致核子戰爭的浩劫；甚至也擔心，美國是否會僅爲了西歐受到蘇俄及華約組織的攻擊而不惜訴諸核子武器加以報復？西歐這些矛盾心理和疑慮，特別是在蘇俄發展部署了 SS-20 和逆火式轟炸機之後，更加明顯的表露出來。幾年前美國提出在西歐部署中

註② *Ibid.*, p. 235.

註③ *U.S. News & World Report*, Dec. 12, 1983, p. 41.

註④ See Morton H. Halperin, "NATO and The TNF Controversy: Threats to the Alliance," *Orbis*, XXV (Spring, 1982), 109.

子彈所引起的風波，就是一個顯然的例子。同樣的情形，一九七九年西歐各國同意美國在西歐部署五百七十二枚巡弋飛彈和潘興二號飛彈。但是西歐各國又在另一方面對美國施加壓力，希望美蘇雙方儘速達成裁減戰略武器和中程飛彈的協議；對飛彈部署地點的選擇，百般不予合作，推遲部署時間；在民間反核反美的運動也一再掀起。如果不是蘇俄在一九八三年年底杯葛美蘇戰略武器裁減談判和中程飛彈談判，恐怕美國在西歐部署巡弋飛彈和潘興二號飛彈的工作將會往後無限延期了。

七、結語

綜觀以上分析，西歐與美國在安全上彼此息息相關，相互有所需要，這是無庸疑義的。西歐的完全需要靠美國來保障，而美國的國家安全也不能與西歐的安全分開。借用雷克勒博士的一句話來說：「自由獨立的西歐毫無疑問的至關美國的福祉。固然西歐受蘇俄征服，美國依然可生存，但其代價至鉅。如果蘇俄控制了世界最大工業工廠，蘇俄將因而得利；美國與西歐的貿易將告終止；美國的國內民主制度或將變成警察國家；而且美國文化將不再有重大發展。要之，美國之未來離不開歐洲的未來」^②。

不過在西歐與美國這一對彼此息息相關的夥伴之間，一直存有歧見，時生齟齬，無疑在自由民主陣營裏自亂了腳步。這也是關切自由世界未來前途的人士所憂心忡忡的一點。如何消除歐美之間歧見，加強自由世界的團結，這正是我們關切世局，展望未來，所應正視的問題。

一九八三年西德書商和平獎獲得者史佩伯在領受獎金時所發表的一段話，實在是值得西歐人自省的警語。他說：「許多歐洲人的仇美反美態度是一種最露骨的忘恩負義行爲。這是個人與民族自求生存最低級的表现形式」^③。他又指出，西歐的和平主義者正在爲莫斯科不戰而征服西歐鋪路。所以認爲蘇俄不會吞食西歐，無異是在爲西歐挖掘墳墓。

同樣的，美國也必須改變對西歐的態度，重新檢討和建立新的對歐政策。美國必須從全球戰略觀念上改變「挾中共以制蘇俄」的錯着。在今天，美國不但不能聽任其影響力在歐洲日走下坡。相反的，美國應在歐洲重振昔日的地位。只要強化在歐洲的力量，自然也就形成對蘇俄的直接箝制，而不必借助於中共。所以美國採取「聯匪制俄」，不僅會使美國失去歐洲，也會使美國失去亞洲。

民國七十三年三月五日脫稿

註② Jeffrey Record, "The Europeanization of NATO: A Restructured Commitment for the 1980s," *Air University Review*, XXXIII (Sept. —Oct., 1982), 23.

註③ 引自《星島日報》，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